

窑变 798

叶滢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窑变798/叶滢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7

ISBN 978-7-80225-946-1

I. ①窑… II. ①叶…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7702号

窑变798

叶滢 著

责任编辑:黄鸥 李兵

责任印制:韦舰

书籍设计:孙浚良

排版制作:刘青(BESPOKE ASSOCIATES)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8831088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8

字 数:120千字

版 次:2010年7月第一版 2010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946-1

定 价: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更换。

摄影:李骁 邓华

部分图片由思想手设计以及受访者本人提供

历史图片提供:原718联合厂老干部协调小组

稿费暂惠存于出版社,望作者联系为盼

窑变 798

叶滢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我们在哪儿

“每次我看中的地方，最后都会消失。”

第一次来到这片工厂区，缘于一次访问，那时并不知道这一片区域的具体名称，当时还在中央美院教书的皮力开车从花家地带我到了仁俱乐部，为的是找到一个清静地方说话。俱乐部里四下无人，水泥墙、一黑到底的地板和沙发，这是我第一次和皮力长时间的谈话。时间是2002年春天的某个下午。

他在黑色的长条桌边比画着，当代艺术应该有自己的生态系统，学院、基金会、画廊、拍卖行……中国还远远没有建立自己的艺术生态，尤其是非营利系统，比如艺术基金会，他谈到中国当代艺术奖。“瑞士收藏家乌利·希克你知道吗？中国当代艺术奖就是他发起的。”2002年，皮力曾经担任过这个奖项的艺术总监。“我想做的是非营利的艺术基金会，这是画廊和学院之外，平衡艺术系统的力量。”这是皮力没经历过的尝试，但如何开始，却并不明了。

那个下午的谈话，这个几乎与我同龄的美院教师身上的不安分感染了我，当时我刚刚来到一家新创立的报社，我们的出版人雄心勃勃地说，我们要做中国的《纽约时报》，2002年前后，报纸的报道常常会在文章开头援引《纽约时报》或者《时代》周刊的描述。在每周一次中午办公室同事例行的午餐中，话题常常从《经济学人》刚写的评论转到《连线》杂志的封面报道，这群出现在新一轮媒体热潮中的年轻人，对于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立场和工作方式的兴趣，远远大于他们对于周围文化环境的了解。在当时，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热情与皮力对于西方艺术系统的描述，几乎成为平行的线索。外部世界已经打开了，充满各种未知的可能，未来看上去新鲜而有希望。

我就是以这样的热情介入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报道之中。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描述已经不能满足我对于周围环境的好奇心，在互联网泡沫刚刚消退，在北京即将面临非典、奥运会还远的时间段里，这座城市的时态正在发生变化，却并未明朗。

此时的798，仍在巨大的灰色厂房中沉睡，对于自己的前途尚不明了的皮力对于仁俱乐部的未来并不看好，这里客人寥落，空旷的黑色空间寂静得像一艘无人的船舱，那时我并不认识“仁”的开发者、在三里屯南街开过芥末坊酒吧的冰冰，更不知道她在这里——798工厂区原来的食堂改造成LOFT空间的前因后果。

和皮力的谈话时间充足的另一个原因，我想是因为当时仍在美院兼课的皮力并没有后来那么忙碌。不久之后我得知，他到王小帅导演的《青红》剧组做制片人去了，关于当代艺术的话题忽然打住。《青红》在戛纳的亮相显然在短时间内满足了皮力对于外部世界的好奇，但皮力制片人的头衔仅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

我们再次见面仍然在798。

2003年8月的某天，皮力策划的展览《非聚焦》在长征空间开幕，非典之后，北京忽然多了不少艺术展览，在这样的展览开幕中你会看到各种神头鬼脸的中外面孔，他们好像深谙某种特殊的语言，用某种若无其事的郑重来表明自己所在的场合的特殊性，在由艺术家、记者、使馆文化处官员以及某些长期的艺术爱好者、状况不明的收藏家组成的这个群体里，皮力显然更如鱼得水，他不再是某些官方展览的执行策展人，这是他独立策划的展览，独立策展人的概念在当时呼之欲出，在独立电影、独立音乐这一系列北京流传的文化语态中，独立策展人所代表的体制外操作，显然具有某种“先进”意味。但这个特定的称谓很快就变得模棱两可，“独立”所具有的体制外含义，在2003年之后兴起的当代艺术市场中，被艺术商业化于无形。三年之后，同样在798，九十年代就开始策划各种展览的冯博一自我解嘲地说，要给自己印一张“不是独立策展人”的名片，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至于长征空间是一个怎样的“空间”，它是画廊，还是基金会？是商业还是非营利机构？这些问题在2006年与创办人卢杰的一次谈话中，我得到了一些听起来非常玄的回答：“一个地下独立

的，我把它叫做黑道；国际机构和老外是白道；另外还有一个红道，就是美术馆和美术学院。无论是哪个结构，彼此暧昧，彼此混合，彼此依赖。”卢杰没有正面回答我关于空间方向的回答，只是含混地说：“我们在这三个层面都在工作。”

对我来说，798里的仁俱乐部在2003年夏天是私人记忆的一部分，当时并未成为北京文化地标的工厂里深藏着这样一个黑色的宝盒，我和我的朋友们常常在深夜来到“仁”，这里是黑夜里的游乐场，偌大的舞台随时可以即兴起舞，有人常在钢琴上即兴弹奏一曲，仁的夜晚只有一个男孩值班，他每次都为我们的来临提供最大的方便，甚至在金汤力鸡尾酒中添加了过多的金酒，将我们中的某些人醉翻。那时的798，还没有路灯，一群人在寂静空旷的厂区内高一脚低一脚进到厂区，黑色的仁俱乐部会亮起所有的灯，我们钻进调音室自己选唱片，有人在舞台上跳舞弹琴，有人在黑色沙发上喝酒聊天，这是我们无人打扰、自得其乐的夏天，对这里的主人冰冰来说，则是一个艰难的季节，无人光顾的俱乐部如何生存？

这样的寂静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在黄锐、徐勇发起的“再造798”和大山子艺术节的带动下，798作为一个特殊的艺术区域的名声在非典之后迅速蹿起，“仁”的活动，从音乐会到品牌发布，从公司年会到个人婚礼，接踵而至，我曾经在这里邂逅了一场婚宴，在不相识的众人中，混喝了几杯喜酒，也曾经在这里看过一个电视剧组用干冰把这里变成了想象中的仙境，当时再去“仁”，无非是想重温我们独自欢乐的夏天，这个自私的目的在2003年之后再也没有实现。“仁”在冰冰的经营下，离最初的寂静越来越远。这一次，皮力关于仁俱乐部有些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实现。而他自己，似乎也不再停顿或者彷徨，2005年之后，开始经营起了自己的艺术空间。

第一届大山子艺术节之后，各色生动的面孔开始在798往来浮现，关于从日本回国的黄锐，也有很多难以确认的传闻，直到我

们在AT Café和他的工作室的一次长谈，我才了解了他从七十年代末到2000年以后的经历。

在798策划大山子艺术节的黄锐几乎是798组织活动最活跃的艺术家的。他在七十年代末曾为当时的《今天》杂志做美术编辑，他经常提及北岛、阿城这些名字，这个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因为写“反动”诗歌“进去过”的艺术家，更像一个在社会、政治、艺术之间来回穿梭的活动家，他说自己这些年的艺术作品就是对社会的“参与”。在“参与”中进行艺术实践并进入社会新闻的黄锐，2002年在798里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他从七十年代戴着眼镜面色严肃的美术编辑到今日穿着日式麻质衣裳的成功艺术家，经历了往日的艺术低谷和2000年之后市场的繁荣。黄锐的同代人大多已淡出了文化中心，而他还在不断制造新的焦点或者漩涡，这个当年在政治不明朗的状况下写诗画画编地下杂志的文艺青年，是如何在今天的国际艺术论坛上宣讲以798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

在黄锐位于798的工作室里，挂着一张他创作的油画《民主墙》，画上的那群人，为今日798的现实叙述提供了更绵长的时间布景。黄锐画中那种特属于七八十年代的质朴与热情已经被新的冲动所代替，新一代人孜孜以求的是建立新的艺术体系。如果说，黄锐的种种“参与”还带有乌托邦式的游击战特性，新一代的皮力、卢杰、冷林们则对外面的世界不再只是懵懂地憧憬，他们迫切地希望介入到全球使用同一种语言的艺术游戏中，在他们身上，你看到的不是艺术的浪漫与感性——这样的情绪可以留给艺术家，这些新的艺术策划人对政治和社会保持着小心的距离，他们的活动范畴也与权力中心若即若离。八九十年代，当代艺术与政治的张力关系在现在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中也很少看到了。在全球一体化的艺术体系中，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是常规的日程，在这些艺术策展人或者画廊主的议题中，纽约MOMA、泰特现代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是更为频繁出现的地标，他们期望建立职业艺术制度的热情与此

时商业社会对MBA工商管理课程的热衷是同步的。在一个文化价值观和专业能力同样稀缺的社会里，对于专业能力的迷恋暂时掩盖了价值观的崩塌带来的空洞。

2005年之后，798不再需要大山子艺术节这样的活动来制造社会话题。被规划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798也建立了管理办公室，在办公室的操持下，开始举办官方性质的创意文化节。大量的画廊开始进驻798，与此同时，苏富比、佳士得两大拍卖行的中国当代艺术品价格飙升，作品刚以百万元计很快就进入千万元级别。在股市和房市之后，报纸的财经版面出现了艺术作品的价格指数。艺术家们也从被社会冷落的群体进入了成功人士的行列。

北京公社在2006年进入798之后，举行了张晓刚、岳敏君等一系列当时在市场上备受瞩目的艺术家的个人展览，这些展览无一例外，都与艺术家们在拍卖行上出现的作品有所区别。北京公社的创立人冷林身份混杂，他是艺术评论人，也在拍卖公司工作过，甚至还以艺术家的身份参加展览，北京公社在他的描述中，是一个介于画廊和博物馆之间的空间，这既是学术上的要求，也是商业上的需要，在一个专业环节缺失的环境中，缺乏学术标准和规范，也缺乏独立的艺术评价系统，画廊只有自己来培养“学术”环境，带动对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推广。

在营利与非营利机构之间摇摆的艺术空间最终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做出了将营利与否模糊化的选择，此时在中国的当代艺术领域中，各种名目的艺术博物馆、基金会、画廊、拍卖行等都已经出现，但一个看似与西方职业化艺术系统相似的艺术环境，却缺乏支持这个体系的法律和经济环境，进行的也只是样式上的模仿。

2008年北京奥运所带来的全球性的中国热中，中国当代艺术醒目的社会文化符号很快被《纽约时报》、《卫报》这样的西方主流

媒体所选择，从2007年《纽约时报》杂志上的中国当代艺术群体报道——从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到当代艺术收藏家管艺的人物故事，到《纽约时报》2008年前后对于岳敏君、蔡国强、曾梵志等人白描式的细致刻画中，这群艺术家的形象颇为复杂，他们既是时代变化的见证人，也承受着社会变化的跌宕。作为最早进入全球化文化市场的群体，他们既是受惠者，也有自己的焦虑和疑惑，如果说八十年代兴起的当代艺术群体曾热情地投身于社会启蒙和文化运动，今天，艺术家们除了分享社会财富之外，对于巨大的社会变化，他们往往只做出隐晦的评论，采取的也多是观望态度。太多看似美好的事物以最快的速度包围了艺术家们，时尚杂志的封面、奢侈品品牌合作的展览、络绎不绝的各国收藏家们……2008年，从年初香奈尔在香港举办的“流动的艺术”当代艺术展到年底在798举办的展览“迪奥与中国艺术家”，艺术家们与时尚品牌的关系，已经成为艺术市场热之后的又一轮狂欢。

这一年，我在亚洲各地经历了频繁的旅行，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迪拜到新加坡……在不同的艺术博览会上，市场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热情逐渐降温，很显然，潮水般突如其来的包围，正在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渐渐退去。

奥运之后，中国热开始退烧，海外媒体对于中国当代文化不遗余力的发掘在2008年后冷淡了很多，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到来也直接影响了艺术市场。2008年奥运期间，纽约画廊佩斯·威登斯坦画廊(Pace Wildenstein)建立的佩斯北京在798举行了第一个展览，之后一年，这个空间在北京没有举办新的展览。

798巨大的厂房仍然矗立在那里，大多数的车间和工人们已经从这里迁出，经过了2006年前后大量画廊入驻的热潮，这里的建筑景观也渐趋安静。从第一届大山子艺术节开始，我在这里和几十个艺术家、策展人、画廊主们有过长短不一的谈话，看展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我度过周末的生活方式。798的大

窑炉在几年间改换门庭，演变成了现在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06年，这个艺术中心正在进行改造，当时的尤伦斯基基金会主任费大为曾经憧憬在这里建立市场之外的学术系统，两年后，法国策展人杰罗姆·桑斯接替费大为担任尤伦斯艺术中心馆长，带来的是法国奢侈品牌迪奥与中国艺术家的合作，关于尤伦斯艺术中心的去向一度众说纷纭。

冷林曾在和我的谈话中说，艺术系统是动态的，各个环节都在新的环境中发生变化。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的城市，即便如此，身边的变动还是快得让人难以捕捉，它们常常突如其来又瞬息散去。

在798最初的宁静中，我曾经和我的朋友们分享大厂房里的夜晚；也清晰地记得在常青画廊看安尼斯·卡普尔的展览时，在空间绵延不息的白色气流带来的类似宗教性的体验。在北京，很难有一个公共空间承载了自己这么多的感受和记忆。最近一年多，我去798的次数渐少，从第一次采访皮力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七年，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知也在变化，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艺术家们反反复复的观念游戏，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区域。如果问自己，在对798这些年的采访和写作中，我已经习惯了“在而不在”的职业位置，作为在场者，我对每一位谈话者心存理解，他们所经历的事业起落和内心焦灼，是我这样一个叙述者难以切身体验的，我愿意听他们诉说自己的抱负和困惑。在这样一个急促膨胀的年代，一次面对面坦诚的谈话，对于谈话双方都是纾解和缓释。同时，我也有意识地做到部分的抽离，如果和对方离得太近，会看不到自己和对方的准确位置。那种从十几岁开始采访写作就习惯了的距离感，总是让我在每一次谈话后一再确认谈话者的具体位置。但我还不是一个好的摄影师，在一个背景动荡的环境中，确认“我们在哪儿”——聚焦是如此困难，我只能希望自己的发问尽量得到接近真实的回答，给经历这一轮变化的过来人留下一份基本的记录。

关于798的故事，不会因为我的在或不在而休止。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已经有不同的采访对象对于谈论这个话题感到了厌倦，过度的媒体曝光一度让这片区域闪亮到几乎刺眼，而我在翻看了其中的大部分报道之后，仍然觉得有将这本书完成的必要，符号性的展示并没有揭示这片工厂艺术区生长衍化的肌理。艺术生态的渐次消长与时代变化的关系、不同群落的生存状况和其中人物的个体声音，这些尚缺乏的记述正是我想在这本书的写作中完成的。我也非常清楚，在这次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我还没有到达自己期望完成的限度，在描述时空变化时，我自己一样也被外界的动荡所拉扯，还缺乏足够的定力去仔细勾画自己笔下的人与事，还没有足够的耐心去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

生活在北京，常常会目睹外部世界超现实般的改变。比如，在常常经过的央视新址上，我看到一个钢铁水泥的庞然大物怎样从无到有拔地生长；也在2009年初春的某个夜晚看到它火焰升腾，烟熏火燎后如一座Ghost City。建筑的生长与毁灭突如其来，在快速的变化中，同时代的人又怎能奢谈秩序与稳定？

旧的结构被打破了，新的图景仍在期望和摇摆中。当年和我一起饭桌上谈论《纽约时报》和心怀创办一张新生报纸梦想的同伴们大多选择离开了书桌与写作，当年的乐观情绪也在被新的焦虑所替代。

当代艺术真的在创造新的观念和价值吗？这个时代还存在另外的生存空间吗？今天的文化到底是走向开放还是封闭，多元还是单一？

这些问题显然不是这本书能够回答的，作为一个提问者，我把这些问题留给访问对象，也留给可能遇到的阅读者，当然，这些问题首先是留给此时的自己，在生活面临转折的特殊时刻。

2009年8月16日
于北京







